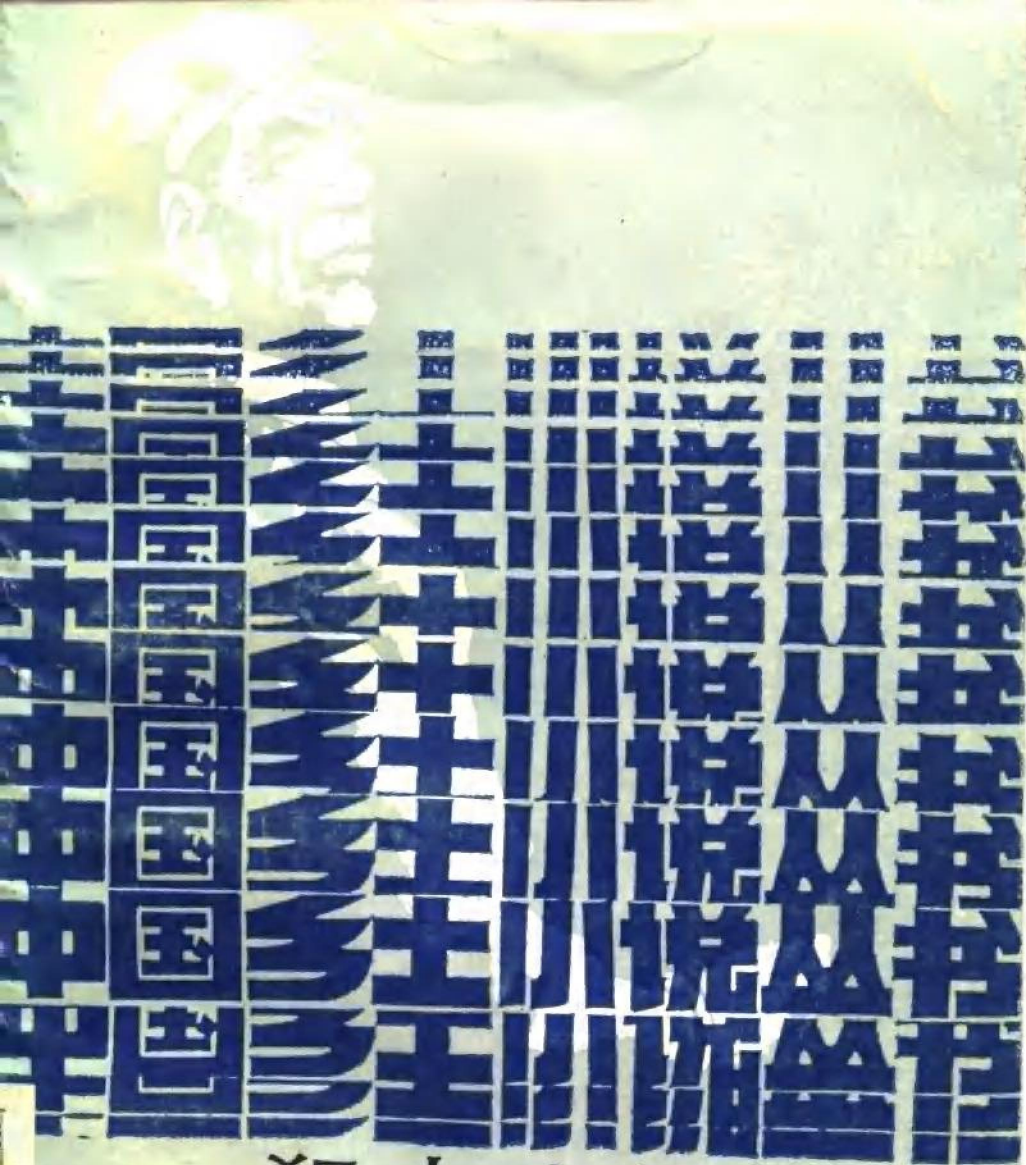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张一弓

中原农民出版社

中国乡土小说丛书

犯人李铜钟 的故事

张一弓

中原农民出版社

中国乡土小说丛书
中国乡土小说丛书
中国乡土小说丛书
中国乡土小说丛书
中国乡土小说丛书

内 容 说 明

张一弓是近年来被时代的潮头推上文坛的著名作家。本书收集了他自1980年以来创作的八部中篇小说。其中《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有多部被搬上电影银幕，受到广泛的赞誉。作者以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独特的艺术风格，活泼新鲜的语言，浓郁的乡土气息，忠实而生动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大变革中的色彩斑斓的农村画卷。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 张一弓中篇小说集 ·

责任编辑 李明性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7 印张 396 千字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统一书号 10394·4 定价3.05元



作者小传

张一弓，1934年12月出生于河南开封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籍是三国时代刘备在那儿当了几年县令的新野县。他自幼做的是文学梦，但在1950年自开封高中二年级肄业后，却做了近三十年的记者和编辑工作，后来又在中岳嵩山之下的乡村工作三年。五十年代，他曾发表过好象是小说的习作，因受到所谓“鼓吹人性论”的批判而搁笔。1980年以来重新发表文学作品，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张铁匠的罗曼史》、《火神》。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河南省文联专业创作员。

目 录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1
山村诗人·····	52
赵镢头的遗嘱·····	104
张铁匠的罗曼史·····	190
流泪的红蜡烛·····	262
山村理发店纪事·····	328
火神·····	379
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	478
后记·····	538
附录 未收入此集的作品目录·····	540
对张一弓作品的部分评论索引·····	540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一 清明时节

清明时节为什么总要下雨呢？那无声的、细细密密的雨丝，如同编织着银色的网，和纷乱的思绪纠结一起，笼罩在地委书记田振山的心头。

田振山正坐在吉普车上，去一个偏僻的山区小县，参加一个党支部书记的平反大会。

这位支部书记离开人世已经十九年了。十九年来，历史给人们带来多少意外的纷扰，开了多少严峻的玩笑啊！但是，田振山始终没有忘记这个人——李铜钟，这个出生在逃荒路上、十岁那年就去给财主放羊的小长工，这个土改时的民兵队长、抗美援朝的志愿兵，这个复员残废军人、李家寨大队的“瘸腿支书”李铜钟。就是这样一个李铜钟，临死却变成“勾结

靠山店粮站主任，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抢劫国家粮食仓库的首犯”李铜钟了。

而现在，历史又作出新的判决：李铜钟无罪。尽管县委、地委对于李铜钟的平反有过激烈的争论，尽管作出平反决定以后还有一些同志对此忧心忡忡，新上任的地委书记还是决定亲自参加这次平反大会。为了让活着的人们更加聪明起来，为了把人间的事情料理得更好一些，他要到那个阔别十九年的小山寨里去，到那个被野草覆盖着的坟头上去，为一个戴着镣铐的鬼魂去掉镣铐了。

吉普车在山区公路上颠簸着、急驶着。田振山打开车窗，让清凉的山风把无声的细雨吹洒在他刻满皱纹的脸庞上，他合上眼睛，想起了那个发生在十九年前的奇异的故事。……

二 春 荒

党支部书记李铜钟变成抢劫犯李铜钟，是在公元一九六〇年春天。

这个该诅咒的春天，是跟罕见的饥荒一起，来到李家寨的。

自从立春那天把最后一瓦盆玉米面糊搅到那口装了五担水的大锅里以后，李家寨大口小口四百九十多口，已经吃了三天清水煮萝卜。晌午，“三堂总管”——三个小队食堂的总保管老杠叔，蹲在米光面净的库房旮旯里，偷偷哭起来：“老天爷呀！暖暖暖暖……你睁睁眼吧，……你不能叫俺再挎要饭篮，暖暖暖暖……”

哭，也是一种传染病。老杠叔的哭声从没有关严的门缝里溜出来，首先传染给那些掂着饭罐来食堂打汤的老婆婆们，接着又传

染给那些家里有孩子喊饥的年轻媳妇们，再往后，就变成连男人们也无法抗拒的一场瘟疫了。

“不能哭，不能哭。”沉重的假腿在雪地里“咯吱咯吱”响着，李铜钟从大队部跑过来，向大家讲着不能哭的道理：“哭多了，眼要疼，头要晕哩；哭多了，也要伤身体哩。我眼下再去公社问问，说不定统销粮有消息啦！”

哭声平息了。大家都无言地望着年轻的支书。这个百里挑一的强壮汉子，也明显地饿走样了。他眼皮虚肿着，好象能掐出水来，四方脸庞上塌下了两个坑儿。但他颠拐着七斤半重的假腿向村外走去的时候，却把屋里人张翠英递给他的柳木棍扔得远远的，穿着褪色军大衣的五尺四寸五的身个儿照旧挺得笔直，网着血丝的黑沉沉的大眼睛还在打闪哩。那姿态和眼神都仿佛告诉大家：这个复员兵，还能打几仗哩。

李铜钟的心里却是沉重的。当他想着要向那位“带头书记”杨文秀要饭吃的时候，心里就充满了愤懑和忧郁。

“带头书记”原来是一位文采出众的小学教师，后来被提拔到县委宣传部当了干事。他辛辛苦苦干了五年，渐渐感到，在县委大院里，象他这样一个没有区、乡工作经验的人，往后能当上秘书，写一点“遵命文牍”就算到顶了，“鸡蛋壳里发面——没有大发头”啊！因此，一九五八年，他积极报名下基层工作，当了十里铺公社的党委书记。从此，他就把全副精力用在揣摩上级意图、并在三天之内拿出符合这种意图的典型经验上了。比如他来十里铺上任以前，听说理论界提出了一国能不能首先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他立即感到这同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的论断具有同等的意义。他依次类推，得出结论说，一个公社首先进入共产主义也是完全可能的。这个公

社当然就是十里铺公社。因此，他上任第二天，就向大家宣布：十里铺公社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此后，他每天都要吸两包烟卷，那双好象用小刀子在脸上随便剃出来的小眼睛总是眯细着、眨动着、闪烁着神秘的光，盘算着十里铺公社各项工作怎样跑在前头，选择县委书记田振山没有外出的时机，向县委报喜。

过分卖力的时候，动作是容易变形的。上级意图——且不说这意图是否正确，一经杨文秀加工，就会变成一幅极其夸张的漫画。大办钢铁时，他命令村村队队砸锅炼铁，没收一切可以搜集来的铁器，门鼻、门搭勾无一幸免，统统砸碎，填到“小土群”里，吓得李铜钟的屋里人连连祷告，千万别叫炼铜，因为她的男人是“铜钟”。县委号召建立丰产方的时候，他又指示各队：丰产方一律建立在大路边，粉要搽在脸上。为了充分表现报纸上说的那种“老人赛过老黄忠，妇女赛过穆桂英”的冲天干劲，当检查团到来的时候，他让社员们化妆劳动，锣鼓助威，老汉们挂着业余剧团的长胡子下地，妇女们穿着古装戏衣，打着穆桂英的“帅”字旗。

李铜钟用忧郁的目光望着这一切，他觉得新上任的公社书记整天都在演戏，在给上级演戏，巴望着受到赏识和喝采。他嘱咐李家寨的干部：“李家寨都是种地户，不是戏班子，咱不要他那花架子、木头刀。”

但是，李家寨也没能逃脱“带头书记”带来的一场灾难。去年天旱，加上前年种麦时钢铁兵团还在山上没回来，麦种得晚，一晚三分薄，秋庄稼又碰上“捏脖旱”，夏秋两季都比不上往年。而“带头书记”又带头提出了“大旱之年三不变”的豪迈口号，产量不变、对国家贡献不变、社员口粮不变。结果，两头的“不变”落空，只是经过“反瞒产”，才实现了中间那个“不变”。

正是因为这个“不变”的缘故，在十里铺公社应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李铜钟不得不跛着腿，一趟接一趟地往公社跑着，向杨文秀汇报着使共产主义变得十分渺茫的春荒问题了。

每去公社一次，对李铜钟的忍耐力都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第一次，是李家寨社员一天还能吃到“二大两”的时候，也是杨文秀把县委、县人委颁发的超额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的奖状挂到墙上的时候。

“李铜钟同志，”杨文秀的声音是严厉的。“你知道是哪些人叫喊粮食问题吗？”

“知道。”

“哪些人？”

“贫下中农。”

“你说啥？”杨文秀困窘地把烟卷举在空中，怔住了，但很快又在空中划一个圈儿，说：“新中农吧，是新的上中农嘛，同志，你的屁股不要再坐到富裕中农的板凳上了。”

没等李铜钟回话，“带头书记”已经迈着跃进式的步伐，冲出了小会议室。

第二次，是李家寨眼看就要断粮的时候，也是杨文秀亲眼看见李家寨的榆树皮已被剥光的时候。

“李家寨的口粮是有点紧张。”杨文秀避开了李铜钟的黑沉沉的眼睛。“可眼下的精神还是反右倾啊，反两眼向上的伸手派啊，不是我不愿向县里要粮食，就怕那顶右倾帽子不好戴啊！”

“你把帽子给我。”李铜钟沉声说，“只要反右倾能反出粮食，反出吃的，这右倾帽子，我戴一万年。”

“不要意气用事嘛，同志。”杨文秀踱着步子，说：“口粮不足，不光你一个李家寨嘛。听说地委正开保人保畜会，咱县田

书记去了。等他回来，听听精神再说。你们食堂菜地种得不赖，再顶一阵子嘛。”

李铜钟，你有多么坚韧的忍耐力啊。但是，历史证明，肚子的忍耐力是有限度的。在吃了三天清水煮萝卜以后，食堂门口传来了社员们的哭声。虽然三天前李铜钟就托人给县委书记田振山送去了一封“告急信”，并按照李家寨坐头把交椅的文化人、会计崔文的建议，在信上划了三个象炸弹一样的“！”，但还没有收到回音。李铜钟只好再一次用他的假腿，“呼通、呼通”地敲打着公社门口的青石台阶了。

“铜钟，不用说了。”杨文秀推着自行车往门外走着。“田书记回来了，县委通知开会，专门研究社员生活，你回去等着吧。”

“可眼下？……”

杨文秀已经蹬上自行车，一阵风似地走了，但他回过头来喊叫：“萝卜。”

李铜钟回来了。路过好汉坡时，他觉得头晕，脚不把滑，一下子栽倒在路沟里。他一动不动地躺在积雪上，没有力量爬起来。他很想这样躺下去，永远躺下去，不再起来了。但他想起还有几百口人在等着他，想起县委在开会，说不定田书记已经收到了那封告急信。于是，他吞了几口雪，挣扎着爬了起来。当他走到寨门外时，已经挺直了腰杆，对守在寨门洞里等他归来的干部们说：“宰牛吧。”

三 “花狸虎”的悲剧

“把我宰了吧，把我煮锅里吧！”在三队饲养室里，李套老汉死死抓住“花狸虎”的缰绳，愤懑地喊叫着：“谁的主意，吃牲

口？干脆把我吃了算拉倒！”

队长小宽牵着牲口说：“套叔，你掂量掂量，保人、保畜，哪轻哪重？再说，这是大队的决定，俺铜钟哥拿的主张。”

“是铜钟？”李套老汉怔住了，他没想到这是他那个残废儿子的主见。论家法，他是“领导”；论国法，铜钟可是上级哩。看来，“花狸虎”的命运已经不可改变了。“中，中，你牵走，这儿槽牲口你都牵走，咱散伙，咱不过了！”李套老汉松了缰绳，不忍心再看“花狸虎”一眼，就坐在小板凳上，脸朝墙，哭起来。不多时，食堂屋后传来“哞哞”的牛叫声，他觉得那是“花狸虎”在叫他，好象一把刀剜着他的心，他眼前一黑，晕倒在草垛上。

几个社员把李套老汉抬到了家里。大队卫生室的王先生，拄着棍，匆匆跑来，用指头掐住李套老汉的“人中穴”，差点掐出血来，老汉才睁开眼，把窝在心里的那口气吐了出来。

儿媳妇小声问：“爹，好些儿没？”

老公公只叹气，不吭声。

孙儿小囤儿趴在床头上：“爷，谁惹你啦？”

爷爷只叹气，不吭声。

王先生把铜钟家叫到外间，板着脸说：“人饿虚了，经不住急火攻心，没啥好方子，静养吧。”王先生叹口气，想着牛肉，拄着棍走了。

“花狸虎”已经被绳子捆住四条腿，卧倒在地上。它“哞哞”叫着，一双通人性的圆鼓鼓的眼睛，滴着蚕豆大的泪珠。它绝望地瞪着人们，好象在说：人啊，不要杀我，我还能犁地哩，七寸步犁也拉得动哩，杀了我，够你们吃几顿呢？李铜钟不忍心再下去，悄悄离开了屠宰场。半路上，又忍不住勾回头，从拉起来

的军大衣领子上看了“花狸虎”最后一眼。为了不让自己听见那“哞哞”的牛叫声，他拉下了棉帽耳朵。

铜钟听说爹晕倒了，急忙回家看爹。爹却偏过脸，对着墙，不理他。铜钟明白，爹是心疼“花狸虎”呀。记得是互助组转初级社那年，他带上复员费，跟爹去十里铺牲口市上牵回了这头牲口。俗话说，卖菜不卖筐，卖牲口不卖缰。他的复员费将够买这头大牛。爹就到山货行货场上捡了一根草绳，爹笑着说这是“金缰”，就用这根“金缰”把牲口牵了回来。一进村，爹就指着这头身上有黑色条纹的大牡牛，向组员们夸说：“俺牵回来一头‘花狸虎’，你看它那腿，就是四根柱。”家里窄狭，没处喂牲口，爹就把牲口拴到外屋大梁上。夜里，“花狸虎”啃断草绳，钻到里屋，吃了五斤棉花子儿、六斤半谷种，还把装谷种的一口新铁锅撞到地下，摔了八瓣。“中，中，”爹又摸着胡子夸说，“好吃手，准是好套活。”转社时，爹叫翠英用扭秧歌用的红彩绸，结了个大绣球，挂在牛角上。爹又把一床新铺盖搭在牛背上，骄傲地牵着牛在村里游行，拐弯抹角走了四四一十六条胡同，才来到新盖起的饲养室。从此，他跟牛都在那里住下，度过了七个寒暑。如今，槽上虽说添了十几头大牲口，可爹对“花狸虎”总是有点偏心，他时常抚着牛背，说：“社会主义是辆车，靠它拉的头一程。”

眼下，铜钟站在爹床前，抱愧地说：“爹，‘花狸虎’岁口嫌老些儿，……”

“不说这，不说这，……”爹的胡子哆嗦着。

“爹，等来年丰收后，我还您牲口，……”

“不说这，不说这，……”两行眼泪从爹的眼角里涌出来。

“爹，您是说？……”

“我是说，……”爹用胳膊撑起上半身，直愣愣地望着儿子，小声问：“你对爹说实话，……党还要咱不要啦？……”爹忽然咬住被角，瘦削的肩膀猛烈地抽动起来。

“党要咱，党要咱。”铜钟抑止了内心的激动，凄然说：“党不知道咱忍饥，……”

“那就好，那就好！”爹又挣扎着坐起来，哀怜地望着儿子，说：“那你这当支书的，万万不敢躺下，万万不敢。你没看看？乡亲们忍饥受饿，也没一人逃荒，没一声怨言，那为啥？就因为对党信得过。孩子，四五百口人的死活搁在你身上。爹知道，你肚里也没装一粒粮食子儿，你要是饿得受不住，就想想民国三十一年是咋过来的，想想你那死在逃荒路上的娘，说啥也要把全村人领过这一春天。孩子，爹求你……求你！”

铜钟“扑通”跪在爹脸前，眼里噙着泪说：“爹，孩子我记住这话。”

四 吹牛不报税

牛肉过了秤，连杂碎在内，一口人九两零三钱。为了把牛肉公平合理地装到社员肚子里，大队决定分肉到户。食堂里剩下的白菜、萝卜和烧煤，跟牛肉一起，连夜分了下去。时兴了一年多的集体食堂不声不响地解散了。李家寨一百二十多座农舍里，已经生起煤火，响起了开水滚锅声。“花狸虎”跟另外几头老牛一起，在一百多个砂锅、铜盆、搪瓷盆里冒着热气，就要为人们尽着最后的义务了。

“我不吃，我吃不下。”大队长张双喜象下神一样闭着眼，盘腿坐在煤火台上，推开了女人端给他的青釉大瓷碗。

女人问：“你是跟谁怄气？”

张双喜忽然扬起巴掌，“噼啪”地打着自己的脸，说：“我跟它，我跟它！”

女人惊慌地按住他的手，说：“老天爷，这是你的脸！”

“我就打它！”张双喜又打着嘴说：“我叫你说瞎话，我叫你说瞎话！……你虚报产量，叫全村人跟着受累！……”这个四十岁出头的小个子庄稼人打着、说着，把嘴撇得象瓢一样，十分痛心地哭起来。

张双喜那两片薄薄的被旱烟熏得发黄的嘴唇，并不是生来就有说瞎话的爱好。他传染上这种象感冒一样使人头脑发烧、嗓门发痒的流行病，是在公元一九五八年。

那年麦子收罢，张双喜跟铜钟、崔文去县里参加三级干部会。那时节，省报印着红字的号外——张双喜把它叫做“外号”的，正在连续放射亩产小麦三千七百多斤、五千三百多斤以至八千七百多斤的丰收“卫星”，宣扬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跃进哲学和哲学的跃进，这样就从理论和实践上批驳了“保守派”、“摇头派”、“秋后算帐派”的种种谬论。

那年麦季，这个县尽管获得了空前的丰收，而且有了一个明年把粮食产量提高百分之五十一点五的持续跃进规划，但在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这个县还是受到了严肃的批评：对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缺乏足够的认识啊，持续跃进的步伐落后于形势的需要啊，对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估计不足啊，等等，等等。

面对着地委的批评和“党报的‘号外’”，县委书记田振山跟县委其他领导同志，怀疑自己是大大地落后了。他们感到脚下踩着这块土地，正在报喜的锣鼓声中震动、沸腾的土地，说不定

当真到了马克思他老人家说的“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他们诚恳地反了自己的右倾，按照地委布置下来的指标，在三级干部会上宣布了一个“一年‘上纲’、两年‘过江’”的规划。

“带头书记”杨文秀早已摸透了上级意图，他立即在大会发言中宣布：十里铺公社一年“过江”，迎接共产主义的到来。他引用一首据说是十里铺的民谣，描绘了共产主义的幸福情景。可惜那时文化部门正开展着“全民皆诗人”的群众运动，由于都成了诗人，这首民谣的作者也就无从查考，有些诗句也已湮灭在诗歌的汪洋中了。有幸得到杨文秀的引用而流传下来的，只有这样几个警句：

“咱吃蒸馍，蘸白糖，
你看咱过的瓢不瓢！
咱穿呢子，大皮靴，
你看咱过的得不得！
咱乘火箭，坐飞艇，
你看咱过的中不中！”

田振山在台上连连点头，说：“中，中！”

台下，张双喜却向李铜钟耳语：“咱赶紧出去躲躲吧，一会儿把房顶吹塌了，别砸住咱！”

李铜钟坐着没动，他紧皱眉头，不住地用“号外”纸卷着烟卷，象一个愤怒的火车头，喷出一缕缕呛人的浓烟。

大组会上，要各队报规划时，队干部都变得格外谦虚，互相推诿着，谁也不打头一炮。杨文秀知道张双喜口齿伶俐，讲话煽

动性强，眼下又是特别需要这种煽动性的时候，于是，他点名叫张双喜发言。张双喜却用巴掌捂住半边脸，从牙缝里“丝丝”地吸着风说：“书记，我牙疼。”杨文秀鼓励他说：“不需要长篇大论，只要说到点子上，有个态度就行。”又带头鼓掌，“欢迎欢迎！”张双喜不得不站了起来，而一旦站起来，说话就不由自己了。只见他咳嗽两声，清了嗓门，大声吆喝道：“那就长话短说，我跟俺支书、会计商量了，俺大队老落后，一年上不了‘缸’，只能上‘盆儿’，还是那二号盆儿。”在人们的哄笑声里，他露出最正经、最认真不过的神色，望着屋顶说：“啥时候‘过江’哩？等俺爬到‘缸’沿上，吸袋烟，看看再说。”连那些最不爱笑的庄稼人，也都前仰后合，笑出了眼泪。张双喜神色庄严地坐回到半截砖头上，小声问铜钟：“啥样？”铜钟捅他一拳说：“大实话，是咱庄稼人的大实话。”崔文却踢了踢双喜的脚，往台上努了努嘴。只见杨文秀瞪眼望着他们，紫涨着脸，气得象吹猪一样。

谁能料到呢？李家寨就这样变成了右倾的典型。杨文秀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上缸”和“上盆儿”之争是两条道路斗争在十里铺公社的集中表现；所谓“上盆儿”，实质上表现了小生产者的狭隘性，二流子的懒惰性，摇头派的摇摆性，保守派的顽固性；宣扬“上盆儿”论的人必须转变立场，首先在思想觉悟上来一个跃进，从“盆儿”上跃到“缸”上。

散会回来时，爱唱路戏的张双喜变成了哑巴。

崔文抱怨他：“双喜哥，你发言咋不讲点策略？反正，吹牛不报税。”

铜钟说：“我拥护双喜哥的发言，共产党为群众办事，就得石杵子捣石臼——石（实）打石（实），不要嘴把式。”